

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一個學術典範之消逝

李金銓

壹、「經濟發展」的兩大假設

時人談起國家發展、社會變遷、現代化，總覺得籠統空泛，不容易抓住個中真義。負責國家發展的官員們經常侃侃而道社會生活方式的革新、心理建設或精神文明有多重要，但真正擬訂政策時，眼光却老釘住有立竿見影之效的物質建設，心理建設反倒徒有口惠而實不至；特別是在資源短絀而百廢待舉的第三世界，更多半以提高經濟生產力為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主導原則，經濟發展的一些基本假設無形中支配著「非經濟」領域（包括傳播媒介）的發展目標與方向。

「國家發展」和「現代化」這些名詞，都是美國社會科學家受到美國政府積極鼓勵所創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政府推出馬歇爾計畫，提携西歐各國從殘垣廢墟之中復甦，同時又通過一系列雙邊或多邊援外協定，幫助亞非拉美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站穩脚跟。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瀰漫著一種思想，認為貧窮與愚昧是共產主義滋生的溫牀，而「經濟發展」正是對付它最有力的武器；剛剛掙脫殖民霸權的蹂躪而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元氣原已奄奄一息，不得更復挫傷，故唯有在經濟上爭取長足的進步，讓社會充分地休生養息，才能保證不再陷入國際共產黨陣營的虎口。「已開發」、「開發中」、「未開發」這些名詞不但應運而生，更伴隨著美國在

國際舞台上的政經軍事獨霸而流行起來 (Tippis, 1973)。

質言之，「國家發展」的概念在六十年代期間最鼎盛，其宗旨在於促進經濟成長，或更具體地要提昇國民平均所得。「發展」似乎是一個全盤性的「包裹」，經濟成長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只要經濟順利地迅速成長，國家發展也就水到渠成。綜合來說，當時的思潮假定，經濟成長的目標如果完滿達成，便會出現兩個良好的後果：

(一) 一個社會的經濟財富一旦累積到某個水平以後，在豎的方面會自然而然地像漏斗一樣向下滴 (trickle down)，在橫的方面會向外擴散到整個制度，這致令社會上每個階層不論貧富一律受惠，全都分享到經濟成長的一杯羹 (Berger, 1976)。甚至，有人 (像諾貝爾獎得主佛立曼教授) 根本主張，造產才是平均分產的最佳手段。

(二) 以經濟發展為樞紐，可以帶動其他「非經濟」(包括政治與文化) 領域的改變；經濟活了，政治文化俱活。怪不得有人俏皮的說，這是「好事全包」(all-goodies-go-together) 的假設 (Higgins, 1977; Packenham, 1973)。總之，經濟發展簡直被頂禮膜拜，被當作是打開第三世界人民廣泛參與政治渠道的一把鎖鑰，以此有效地抵制國際共產主義的蔓延。

這兩個基本假設大致上反映了自由派的期望或理想，但歷史的演變似乎並未照這如意算盤落實。近些年，許多學者開始舉證來懷疑上面這兩個假設。就第一個假設來說，大量的證據顯示，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的政策，對「某些」第三世界的確大大地提昇了經濟總產量，但在另外的國家而言，却竟連這一點目標也變成奢求。特別令人悚然心驚的，是有些第三世界的國家領袖 (如五

十年代的印度)急功近利，主觀上幻想在短時間內迎頭趕上西方，竟罔顧其他社會條件能否配合，曾一度盲目地建築大水壩和大鋼廠，厚都市而薄鄉村，全面移植西方「資本密集」的經濟模型，弄得勞民傷財，一敗塗地(Owens and Shaw, 1974)。

再退一步說，即使經濟財富全面增加並累積到某一基點，證據顯示它不一定就照理論預測的「向外滴」或「向外散」，甚至更加深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貧富懸殊。根據一項七十四個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計量經濟資料分析(Adelman and Morris, 1973)發現二十多年來多數國家裏頭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距離愈拉愈大，更加不平等，下階層的生活每下愈況，很難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果實。在亞非拉美，有千千萬萬貧無立錐之地的邊緣人物錯落在歧型發展的繁榮地帶之夾縫中討生活，織構成一幅活生生的人間諷刺畫。這種顧此失彼的經濟發展令許多不幸的第三世界國家未見其利先蒙其害——曾經是巴西經濟發展政策的設計人佛達多(C. Furtado)稱這是「成長而未開發」(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再就第二項假設來說，經濟成長這把鎖匙能否打通社會公正與政治參與的大門，似乎也無必然的關係。有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誠然有驕人的表現，但促進社會公正與政治參與的脚步却遠墜其後，而且爲了專心一致的發展經濟，有時還不得不犧牲其他「非經濟性」的社會價值或目標；南韓、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這幾隻「小老虎」的經濟業績有目共覩，這除了拜賜於政治社會局面的長期穩定，還得歸功於特定社會階層(如工農)的普遍動員，暫時犧牲若干經濟性(如低工資)或非經濟性(如罷工)的權利。但是，有更多的國家在壓榨政治社會資源之餘，經濟却又搞得一

無是處呢？

明白這兩個假設，對於以下的討論很有用，因為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的文獻中，也隱隱約約地（有時則十分露骨）顯示出這兩種自由派的天真假設。

貳、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

「國家發展」這名詞和東西冷戰有密切的歷史淵源。這二十多年，一大群傳播學者嘗試著理論體系的建立，以期解釋傳播媒介能在國家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其中最卓然有成的，以我看有冷納（Lerner, 1958）、宣偉伯（Schramm, 1964）和羅吉斯（Rogers, 1969）等三人。這三個美國學者可謂志同道合：志同，因為他們都認為傳播是最根本的科技變化，所以要善用它來促進（西方式）民主國家發展；這與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不謀而合的。道合，因為他們一脈相傳，冷納最先奠立了理論基礎，宣偉伯把它發揚光大到較廣泛的政策架構去，而羅吉斯則聯繫傳播媒介與人際傳播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功能。

回顧當年冷納提出他的理論系統，是相當偶然的事。五十年代初期，東西冷戰方興未艾，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科學研究所深入中東六國，分頭進行六項個別的研究，發現美國的媒介在宣傳的戰場上輕易取勝蘇聯。這六個國家是埃及、伊朗、約旦、黎巴嫩、敘利亞和土耳其，冷納當時只負責土耳其研究部分。後來，他費了很大的力氣，重新分析所有的研究報告，爬梳現成的資料，並將原問卷的冷戰意味盡量沖淡，於一九五七年撰成一部令人大開眼界的書，名字叫做「傳統社

會的消逝』，立時聲名鵲起，被列入「現代化」研究經典作之一。這本書料不到竟支配了現代化研究的取向達十多年，連宣偉伯和羅吉斯的著作也是根據它的藍圖鋪陳的。撫今追昔，冷納當年寫這本書的材料十分薄弱，充其量是第二手的分析，按理要有大量旁證佐之；冷納敢站在不充分的材料基礎上面建立龐碩的理論架構，毋寧是一種了不起的大膽嘗試，但後來的學者却必須小心求證才行，倘若不此之圖，逕自抓緊他的理論，目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那便不對了。

(一)媒介是現代人格的「魔術擴散者」

冷納的理論其實很簡單。他說：

增加工業化便會提高都市化；提高都市化便會提高（人民）讀書識字能力；提高讀書識字能力會提高媒介的使用；增加媒介的使用會促進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參與。

更具體些，他說，一個國家必須等到有百分之十已經都市化，國民讀書識字率才會有顯著的提高，這時都市化和識字率乃携手共進，直到兩者都達到百分之廿五為止；一旦全國百分之廿五地區都市化，識字率就會躍升，媒介發展就會格外蓬勃和豐富。但這個假設已被後來許多實證研究所否定。

冷納以工業化為國家發展的先決條件，因為工業化吸引安土重遷的鄉民移往都市，這是一種「地理的移動性」（geographical mobility）。人們住到複雜的都市，職業角色和地位於是跟著不變，不能再世襲傳統的模式，以致造成了「社會的移動性」（social mobility），這是現代化生活形態的要素。抑有進者，社會改變的原動力是冷納所說的「精神移動性」（

psychic mobility)，即一個人能夠跳出世襲的傳統職位、角色、地位和身分，敢作「非份之想」，活潑地擬想其他職業的角色和地位；冷納又把「精神移動性」稱爲「移情能力」(empathy)，當一個傳統社會裏頭具有「移情能力」的人多起來，量變引起質變，這個社會便會開始轉變，傳統逐漸崩潰，邁向現代。這是因爲「精神移動性使個人做廣而深的轉變，令社會變遷自行持續下去。」最重要的一點，冷納認爲傳播媒介是刺激、傳遞「移情能力」最好的工具；傳播媒介無遠弗屆，把「現代化人格」普遍擴散到社會各階層去，故有「魔術擴散者」(magic multiplier)之稱。等到傳統人格和傳統的生活形態消逝，現代社會彷彿即在眼前展現。

冷納認爲，「移情作用」既然是現代化人格的具體表徵，如果人人有能力跳出狹窄的範圍去設想別人的職位、角色與立場，那麼社會變遷便指日可待。要使傳統社會長期呆滯下去則已，否則必須全民動員，做到連一介鄉巴佬也能、也敢衝破傳統宿命觀點的桎梏，澈底解放心靈，去想像各種不可思議的角色。記得冷納有一回問一位土耳其的農夫：「要是你當了土耳其總統，你要怎麼辦？」這農夫霎時吹鬍子瞪眼答道：「天呀……你怎能問這種事？我怎能……我不能……土耳其總統……全世界之主！」像這傢伙，在冷納的眼裏，便太傳統、太保守、太缺乏「移情力」，傳播媒介的使命便要改革這種落伍份子。如果我們把這種觀點推引到盡頭，國家發展既然需要社會大眾拋棄傳統的包袱，培養有「移情力」的現代人格，最有效的捷徑自是要從大量建廣播電視台和開辦報館入手。這種狹隘的「媒介決定論」有一陣子居然被許多人採信，雖然現在事隔二十年已經很少人把它全面當真了。

(二) 媒介能做的、能幫忙做的

一九六四年，宣偉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下，撰述『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一書，思路清晰，文字暢達，態度樂觀，出版不久即風行一時，被第三世界決策人士尊奉為國家發展的一部「聖經」。持平而論，宣氏在實際政策的影響比冷納有過之無不及，儘管他的理論架構只是冷納的延伸。反正他們兩個人都將傳播媒介的功能浪漫化、理想化，宣氏甚至開列了一張清單，指出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媒介能做什麼，能幫忙做什麼。宣氏之所以被第三世界的決策官員如此的推崇，相信與他對媒介的功能寄以無保留的信任有關，使得決策官員誤以為迷津已被指點。他們後來才發現問題並沒宣氏想的那麼簡單。

根據宣氏，媒介可以做的事有：

- 一、擴張視野，使傳統社會的人民把眼光放在將來以及現在的生活形態，並通過媒介喚醒國家意識，促進國家的整合。
- 二、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於重要的國家發展項目。
- 三、提高人民的抱負，拒絕被命運擺佈。
- 四、為國家發展創造有利的氣候。
- 五、與人際管道接合。
- 六、賦人與事以地位。
- 七、擴大上下溝通的政策「對話」。

八、執守社會規範，使人不敢輕易逾矩。

九、形成文化口味。

十、改變比較不重要的態度，疏導強固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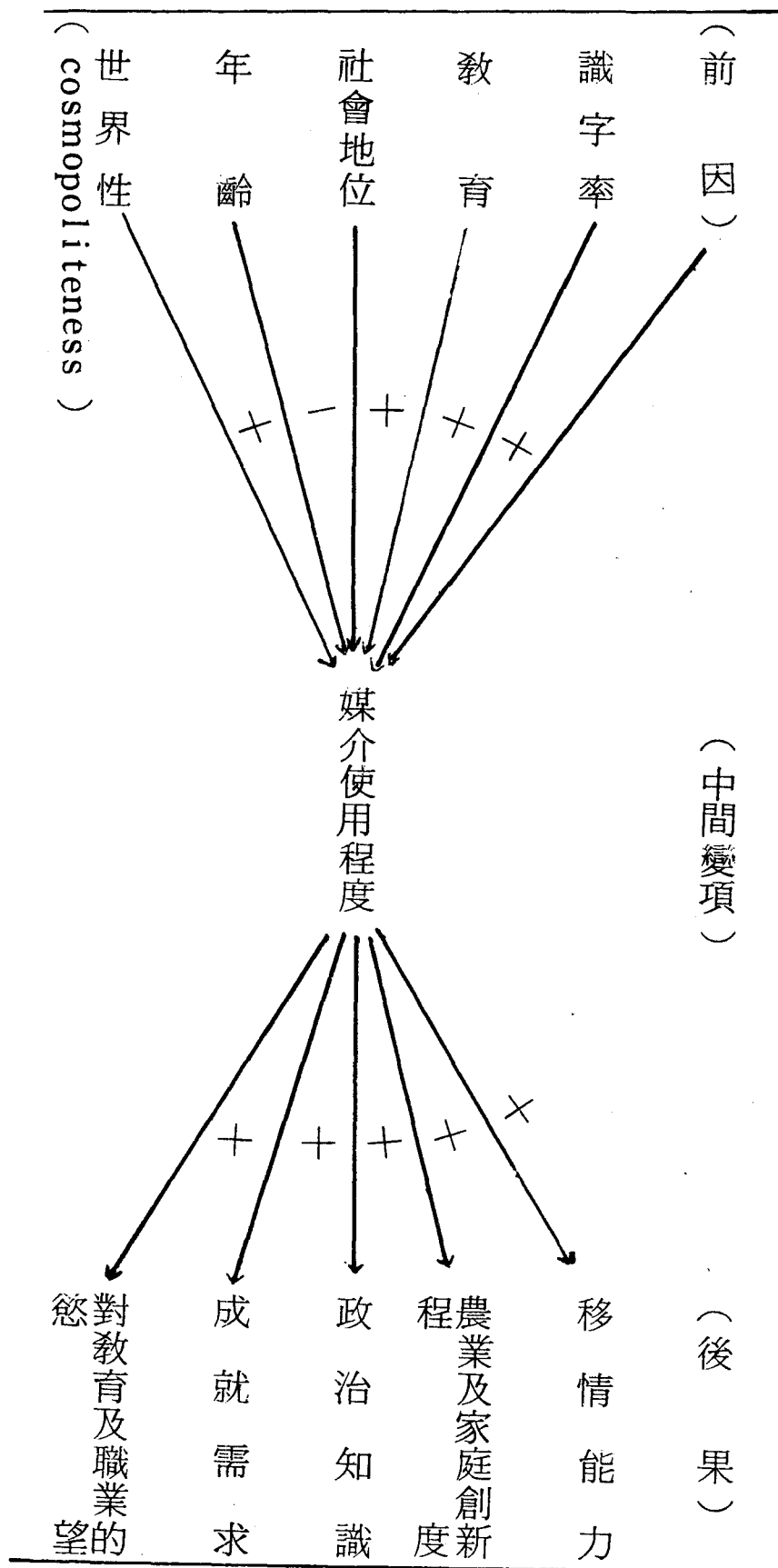
這張清單可以不斷加長下去，大抵上是反映當時傳播研究的一般普遍常識，規範性多於敘述性，缺乏實證材料的支持。宣氏的樂觀而開朗的態度，未始不換得一廂情願、不切實際之譏。他和冷納所看到的盡是媒介的正面功能，但對媒介的負面功能（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有些是預料不到的）完全忽略。

照宣氏的邏輯，媒介能夠做的是提供資訊，守望社會環境，替國家發展充當瞭望台。超過資訊的階段，進入決定的過程，媒介却只能從旁協助。所以宣氏認為，媒介能幫助人們改變根深蒂固的態度、行爲或價值，同時它能幫助做各種教育和訓練工作。如實地說，宣氏把媒介的力量估計太高，似乎是孤立其他社會政治因素講話的。

（三）傳播對農民現代化的衝擊力

一九六九年，另外一位以研究農業創新事物傳佈著名的學者羅吉斯，根據冷納和宣偉伯的理論架構，用統計方法分析了南美哥倫比亞五個村莊農民現代化的過程，寫成『農民們的現代化：傳播的衝擊力』，進一步肯定傳播媒介對國家發展的貢獻。

拿「媒介使用程度」爲例，羅吉斯把它視爲中間變項，本身一方面受自變項（前因）的影響，另一方面卻影響他變項（後果）因此構成以下這張因果網絡圖。



從這張表可見：識字力強、教育程度高、社會地位高、年紀輕及具有世界性眼光的農民，使用媒介的程度較高；而農民接觸媒介的程度也和移情能力、創新精神、政治知識、成就需求，以及對教育和職業的慾望成顯著的正比。依據相同的步驟，羅氏把特定的因素輪流按訂為中間變項，逐一分析它和前因後果的關係。

我對羅吉斯的研究至少有三點批評：

首先，他企圖建構完整的理論以說明傳播媒介對第三世界農民現代化的衝擊力，但他所憑藉的資料基礎卻只是哥倫比亞五個村莊的兩百五十五名農民，抽樣人數太少，缺乏代表性；即使他大量援引其他國家孤立的實證資料，仍然無力建立結論的概括性。不但這樣，羅吉斯似乎將傳播過程真空的抽象化，而抹煞了文化政治經濟因素對傳播的具體影響。

其次，羅氏所用統計分析的模型似乎太過機械化。就拿上面這張表來說，總共有十一個變項，什麼是前因，什麼是中間變項，什麼是後果，應該有二十一種排列組合；爲什麼偏偏看中「媒介使用程度」爲中間變項，一定要有理論上的根據，不可以任意想當然耳。相信羅氏心底必定有一套直覺的理由，卻未形諸邏輯性的文字解釋，頗難令人很表面地就此折服。

第三個批評是因果方向的混亂。既然前因、中間變項和後果之間應該有理論上的聯繫，光有統計數字並無力「自顯」理論。事實上，一個相關係數容許多種互異的解釋，孰對孰錯，孰優孰劣，多半由理論來裁斷。再拿「媒介使用程度」和「移情能力」來說明，到底是媒介的暴露增加移情能力，還是移情能力高的人多接觸媒介，倘若沒有理論的指引，就落得跟雞生蛋、蛋生雞似的糾纏不清。羅吉斯儘管把若干因素輪流設爲中間變項，仍無法解決孰因孰果的僵局。

總括地說，在六十年代期間，雖有大量文獻出現，「證明」傳播媒介是國家發展的動力或觸媒劑，但揆其理論架構大率不出冷納、宣偉伯和羅吉斯的規模，而宣、羅二氏又是冷納的延伸。他們只管稱道媒介的好處，殊不知媒介在第三世界多半淪爲社會控制的工具和保守的力量，很少擔當社會改革的先鋒。

叁、挫傷的年代

冷納原來的理論建立在空中樓閣，至少是一種理想化，企圖將西方的一部分特殊經驗強迫推銷給第三世界。只是碰到冷酷的現實時，冷納的說法經不起實證的考驗即立刻暴露無遺，不得已乃提出「挫折」之說（詳下）略加補充。但這個「挫折」之說對他充其量是「但書」，是注腳，他認為小疵不掩大瑜，始終無意全面放棄原來的理論架構。站在我的立場，卻認為「挫折」之說是具有關鍵性的一點，譬如下棋，一子錯，餘子皆敗，對於原理論的正確性必須大打折扣，而不光是個微不足道的修正而已。

冷納（Lerner, 1963）說：五十年代是慾望高漲的時代，六十年代則是挫折高漲的時代。五十年代，脫離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亞非拉美各國，對遠景充滿無限的憧憬與幻想。這以前，以為「萬事皆備，只欠獨立」，現在已經獨立建國，自然有很多希望、慾望與期望。殊不知獨立歸獨立，現代化歸現代化，它們不久便覺悟到百廢待舉，道路荊棘，却又束手無策，弄得很快就心灰意冷，早被挑動的心弦此時大受創傷，是為一場「挫折日漲的革命」。

冷納以為社會變遷是個人變遷的總和。除了地理上和社會上的移動性以外，最重要的莫過於「心理的移動性」（即移情能力），冷納說「心理移動性」的擴佈是「現代史——甚至是世界性宗教興起與傳佈以來——最了不起的性格變化」。而傳播媒介更是「心理移動性」的「魔術擴散者」，刺激傳統社會的人民不斷幻想一幅新遠景。殊不知社會進步的步伐永遠趕不上慾望的上漲

，慾望容易激發很難滿足，結果人們反而產生嚴重的挫折感，而且慾望愈高，挫折感愈深。換言之，慾望這東西過猶不及；缺乏慾望，逆來順受，接受命運和現實的擺佈，固然個人和國家都不會進步，但慾望失去適當的平衡與節制，挫折必深。

到了六十年代，這場「挫折日漲的革命」逼得冷納不得不擔心會構成全世界（西方式）民主成長力量的威脅。所以，必須在社會穩定的架構下，設法利用傳播媒介合理地動員人們的精力（而不過分刺激他們的慾望），引導他們去積極參與政治，並將他們凝聚為推進民主的力量。慾望若泛濫成災，如脫韁的野馬失去控制，必深深威脅社會的安定。

肆、批判『傳統社會的消逝』

在這一節，我將針對執牛耳的冷納之理論分兩方面作一批判：一是先把他的模式拆開成爲組成部分來討論，二是把它們合併還原，看是否符合邏輯論證和實證資料。

首先，再次把冷納的模式簡化成這個表：工業化↓都市化↓讀書識字率↓媒介發展（即現代人格的魔術擴散者）↓政治參與。接下來，逐一看這五個組成的單元。當然，一個理論本應以整體看待，將它拆得四分五裂是不公平的；但我想藉此指出一點，即冷納的眼裏似乎老看不到社會過程的潛在性負功能（除了「挫折感」以外），只看到顯明的正功能。

（一）工業化：工業化造成環境污染和能源浪費，已是當今「先進」工業國家最頭疼而束手無策的社會之癌。某些漫無計畫、盲目步塵歐美追求工業化的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和五十年代的印

度)先後深受其害。這麼說並不是主張因噎廢食或捨棄工業化的目標，但它的害處却不能閉眼不看。

(一)都市化：跟工業化一樣，造成了貧民窟和犯罪等嚴重副作用。

(二)讀書識字率：許多第三世界的教育內容是與社會需要和文化背景脫節的，教育訓練人們讀書識字，開眼界，提高慾望，但假定社會條件配合不上，學非所用，或失業問題重重，則教育不但不是穩定社會的力量，反而是鬧事動亂的根源。總之，教育和讀書識字是現代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四)媒介發展：先開報館、建電台，未必可以貢獻現代化；要緊的是媒介由誰控制？內容和國家發展有沒有密切聯繫？證據顯示，第三世界的媒介通常是傳達當權者意志的應聲工具，維護既得利益，而很少鼓吹社會改革。此外，外國進口的資訊是否有麻醉作用？是否刺激不必要的慾望？是否跟國家發展的宗旨背道而馳？這些問題都得一併考慮。

(五)政治參與：冷納簡直認為政治參與即是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而他的政治參與便是「投票」。今天，政治學家幾乎都同意，「投票」只是政治參與的一個指標，而不是唯一的目的。就近取譬，冷納的美國投票率遠落西歐各國之後，這到底象徵美國人民的政治冷漠感（這是冷納斷不能同意的解釋），抑或他們滿意現狀，又有投票以外的表達民意途徑，而覺得不必太計較有形的投票呢？再說西方以外的社會制度有它特殊的參與方式，不能說沒有投票就沒有參與，或有投票便有參與。

我無意替工業化、都市化、教育、媒介發展和政治參與抹黑，只是覺得冷納一味強調它們的「光明面」，等到理論落實時便發現多不切實際。

現在再就冷納的理論作整體的觀察，提出五項批評^①。

(一)過程：照冷納的說法，現代化是單線的、直型的過程，必須歷經工業化和都市化等種種步驟，最後才會達成政治參與。但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並未經歷這些過程，便直接跳到投票；它們的投票也許有名無實，但它們從西方經驗中挪借投票制度，却反映投票未必保證充分的政治參與，另一方面也可見冷納的現代化序列和步驟並無必然性。

(二)現代化的途徑不止一條，而有多條。不管學者們對「現代化」怎麼下定義，大多數却同意西方式現代化不是唯一的路子。穆爾(Moore, 1966)根據歷史材料的分析指出，英美式經過歷史演變而有資本主義革命，日德式從上到下而有法西斯革命，蘇聯由下到上而有共產黨革命，殊途同歸，達成「現代化」的目標。這裏我們毋須對各種現代化的途徑作孰優孰劣的價值判斷，但現代化不止一途殆無疑義。

顯然，冷納患了嚴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物種進化，適者生存)的謬誤。他露骨地宣稱西方模式具有世界的通性，可以當做一面明鏡，照亮第三世界該走的道路。他說(Lerner, 1967)...

西方模式彰顯了若干成分和序列，都具有世界性的關聯：故西方模式的意義在於它是個發展的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有概括性，而不只適用於所謂「西方」的地

理區。

又說：

誠然，西方模式實是亞洲開發計畫不可免的基準，因為沒有其他模式可以作此用途。

說穿了，他的意思是：國家發展有一特定的軌跡，西方只是早走一步罷了，第三世界非亦步亦趨不可，這個軌跡有其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不管喜歡不喜歡，都得照它的軌跡發展下去。冷納並斥責一些主張有「非西方模式」的人為缺乏耐心，為「文化本位主義」。

其實，那有這一套「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法則呢？社會史學家狄利（Tilly, 1975）指出，西歐國家形成的過程並非歸因於政府不斷的合理化，政治參與不斷的擴大，或對大眾不斷的安撫；相反的，這過程是榨取性、壓迫性和強制性的——是西歐各國為了鞏固中央統治權，建軍和抽稅意想不到的後果。可以說西歐模式只是幸運而已，並無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更非世界各國唯一可走之路。

怪不得有人批評冷納只投射美國中產階級一廂情願的偏見。不錯，凡是理論必有普遍性，但也不能完全抹煞特殊性；他採用中東一些頗有局限性的資料，竟企圖導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結論，這是很難立於不敗之地的。

（三）冷納的「現代」與「傳統」是分離對立的，這在他的書名『傳統社會的消逝』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實，沒有傳統，那有現代？傳統與現代之間原是有機的關係，何必一定對立？傳統有許多面，我們務求作具體客觀的分析，取精用密，古為今用；現代不能直接自外移植，不與傳統接

筍必無法生根。冷納似乎看不到傳統與現代有創造性綜合的可能；現代化不但未必使傳統某些部份消逝，而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更可推動現代化（Gusfield, 1967；金耀基，1978）。

四第三世界的發展通常是自上而下，有目標，有計畫，集體性的，由精英分子發動領導的，總希望爭朝夕，在短期內奏效，以迎頭趕上西方。當然這個願望不是一蹴可及的，但第三世界的發展與西歐經過數百年緩慢的演變是迥不相同的（Portes, 1976）。

五冷納企圖用一個簡單的心理因素——「移情能力」來解釋總體社會變遷，忽略了社會結構和國際依存的錯綜關係，所以導致了偏頗不全的結論。

如上所述，「移情能力」在現代傳播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很可能加速加深人們的挫折感。第三世界愈具「移情能力」的知識分子愈可能不滿現狀，紛向歐美「移情」，楚材晉用，對於母國的現代化貢獻往往微乎其微。

冷納又視社會現代化為個人「現代化人格」的直線型集體總和。其實，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應該大於個體的總和，而不等於個體的總和。這道理很簡單，只要想到三個和尚沒水吃即明白，故即使人人獨善其身，合起來未必兼善天下；大家具備「現代化人格」也不保證社會的現代化。「移情能力」必須受社會結構與國際關係的制約，一旦把它們帶進來考慮，冷納的解釋更加捉襟見肘了。

奇怪的是冷納和一般社會學家偏喜歡從個人心理來尋求社會的解釋。直到六十年代後期，研究的方向才逐漸注意到社會層次；很多人覺得，問題的癥結和焦點不在個人，而在社會結構的呆

滯僵硬而不公平；該怪的不是缺乏移情能力的「傳統」個人，而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致令個人無法獲得適當的機會發揮移情能力。例如冷納所譏諷的那位土耳其農夫答不出「當總統該怎麼辦」的問題，除了顯然缺乏移情力之外，追根究底，更因為這問題與實際生活毫不相干——求果腹唯恐不及的人，怎麼會幻想黃袍加身的抱負？莫說升斗小民不敢想或不曾想，因為想了徒增煩惱和恐懼，說不定許多當權者也只是因緣附會，隨機會或關係節節高升，當初何嘗想過他掌權時的身分角色呢？再說，到今天拉丁美洲仍有半數人口沒有貨幣收入，還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型態，文盲多，三分之二的鄉村連電源也根本付之闕如，而全國傳播媒介又給少數大都市的財閥所操縱。在非洲情況更慘。傳播媒介對這些普羅大眾毫無意義可言，「國家發展」不是空口說白話嗎？

除了社會結構的因素，國際上強國與弱國的依存關係對國家發展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若干小國寡民（甚至一些大國）的政經文化命運操之在人，被剝奪或自願放棄媒介的自主權，恰對冷納的理論作出無情的諷刺！

伍、小結

傳播媒介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是過去二十多年頗受學術界和第三世界決策者注視的題旨。學者在摸索答案的過程中，已經數易其解釋的焦點，若大略依照時間順序排列，最初從人格心理著手，後來逐漸轉移到社會結構，目前則集中於國際強國與弱國的依存關係，即所謂「文化侵略」

、「傳播帝國主義」和「文化主權」的爭論。

冷納當初所提出的一套理論假設影響力極大，但目前似乎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問題是現在找得出足以取代它的位置的學術新典範嗎？沒有。一九六七年，冷納和宣偉伯在夏威夷東西中心召開一次會議，一派樂觀；一九七六年，他們又召開第二次會議，想法變得保守而悲觀（Lerner and Schramm, 1967; Schramm and Lerner, 1976）；相隔十年的檢驗，兩次會議的語調見解竟有天壤之別，可見學術的探討常走迂迴路。在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的主題上面，原來具有支配性的學術典範已經式微，今後得吸收這個教訓，重新開始建構另一個（或多個）更好的典範。但目前，就像宣偉伯無奈的說：「回到原來的跳板去！」

附註

① 主要文獻請參考 Bendix(1967); Tipps(1973); Golding(1974); Portes(1976); Grew(1977)。

② 本文所引用之學者著作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文作者所著「大眾傳播學——社會、媒介、人」之參考書目，民國七十一年三月政大新聞研究所出版。

註：本文作者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